

第六十一回

英巡捕镇压示威 总工会发动“三罢”

话说孙中山先生接受苏俄代表建议，在 1924 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的势力迅速向全国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全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日高。这预示着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大风暴即将来临。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最大基地，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前沿阵地。1925 年春天，上海涌动着三股反帝潮流，规模越来越大，其中最大的一股，当首推日商纺织行业里的工人运动。

当时，英、日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以纺织行业发展最快。在 1925 年，仅上海一地，它就拥有内外棉、日华、大日本、丰田、同兴、东洋 6 个会社，其中以内外棉纺织会社最大，拥有 11 个纱厂，17000 多名工人。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剥削。那时工人在内外棉工厂做工，劳动时间很长，工厂实行所谓“六进六出”制度，即早上 6 点钟进厂，下午 6 点钟出厂，每天劳动时间长达 12 个小时。每逢周末加夜班，加班工人的劳动时间竟长达 18 个小时！日本的厂主、领班对中国工人群众极尽野蛮虐待之能事，根本不

把工人当人看。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在上海滩找 100 条狗难，找 100 个工人容易。”因而他们把打骂工人视作家常便饭。由于经常殴打工人，日本人发明了许多口头禅，如把用脚踢工人叫作“吃火腿”，用手指骨节敲打工人的头叫作“赏毛栗子”，等等。在工厂里，常常可以看见有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就是被打致残，也不算稀奇事。

除此之外，日本资本家还对中国工人进行人格侮辱，实行“抄身制”，下班工人离厂前，男、女分排两列，要一一接受包打听或抄身婆的“搜查”。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又备受虐待，而他们获得的工资却是最少的。那时内外棉厂里的中国工人日工资只有 3 角钱，进厂不久的新工人仅有 2 角左右。即使这样菲薄的工资，资本家、监工还要层层盘剥。当时有一种“规矩”，工人进内外棉厂，得先给厂主做半个月的活，所得的工钱存在厂里，叫作“存工”，说是退厂时发还，其实退厂时工人很少能拿到。资本家在工厂巧立“储蓄章程”，规定工人每月必须拿出工资收入的 5—10% 在工厂里“储蓄”。工人一旦被开除，这笔“储蓄金”也就归厂主了。此外，工人还要不时给厂主、领班“送礼”，除逢年过节外，那些厂主、领班总是巧立名目，今天“生日”，明天“喜庆”，总之是变着花样，让工人给他们“送礼”。更为恶毒的是，日本纱厂大量雇用童工为“养成工”，一面用更低廉的工资剥削工人，一面又用“养成工”来威胁成年工人。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激起了中国工人的愤怒。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阶级即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

中共当时在上海开展工运的一个重要基地是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前身是 1921 年成立的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由于发生学潮，该校实行改组，更名为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为校长。于右

任并不到校视事，实际上只是名誉校长。1923年4月，该校聘请共产党人邓中夏担任学校校务长，主持校务工作。邓中夏到任后，即锐意改革，他聘请著名共产党人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入校任教，学校声望日隆。共产党人在这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励学生深入工区，开展平民教育运动。该校附设平民教育学校，以加强与工人的联系。这样，上海大学就成为党培养干部和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深入工厂集中的沪西地区，开办“工人文化补习学校”，以联络工人。1924年夏，在文化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党先后派蔡和森、邓中夏、李立三、项英、恽代英、向警予来到这里以加强领导。俱乐部采取通俗易懂、灵活多样的形式，向广大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的宣传工作不久即收到成效，工人们纷纷来到俱乐部接受党的教育，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俱乐部的成员迅速增加，由最初的几十人很快发展到数百人，1925年初更发展到2000余人，他们是党开展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到1925年初，党先后在19个日商工厂建立了秘密工会组织，还在几家工厂建立了党组织。这样，党在广大工人中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中国工人阶级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并且已经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再也不是任人奴役的牛马了，这时如果日本资本家再要无端侮辱他们，中国工人就要奋起抗争。

1925年2月2日，在日商内外棉八厂粗纱车间，一位夜班女童工临下班时靠着墙打盹，被日本领班发现。领班二话不说，上前对这位女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同车间的女工见状，纷纷围上去，有的劝解，有的与领班讲理，领班照样拳打脚踢不止。工人们愤怒了，群起向日本厂主交涉，厂主则立即宣布将粗纱车间

的 50 余名女工全体开除。消息传到沪西工友俱乐部，俱乐部决定举行罢工，以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2 月 9 日下午，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各厂工人同时罢工；接着，日商在上海的 22 家纺织厂工人纷纷响应，相继全部实现了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 3.5 万人。这是日本资本家在华开办企业以来遇到的首次最大规模的罢工。日本政府和资本家始料不及，一下子慌了手脚，他们先是对北京段祺瑞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制止工人罢工，继而又开来炮舰在黄浦江上对中国工人进行军事恫吓。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这些招数，对军阀政府灵验，对中国人民却一点也不灵，于是，日本资本家又转而采取挑拨离间手段，以分化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日本资本家企图分化工人的伎俩，又未奏效。迫不得已，最后资本家只好坐下来与工人谈判，答应工人的复工条件。2 月，罢工胜利结束。

2 月罢工胜利后，广大工人的斗争热情进一步高涨，日商各厂的工会组织进一步完善，党的威信也空前提高。这种局面引起了日本资本家的严重不安，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等待时机向工人进行反扑。到了 4、5 月间，市场上出现棉贵纱贱的现象。日本资本家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先是破坏复工协议，克扣工人工资，进而又开始打骂工人。日本资本家还把固定工资制改为计件工资制，并以最熟练的工人的产量作为计算标准，从而使大批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中共考虑到这时罢工对工人不利，便指示工人用怠工的方法对付资本家。于是，日商各厂工人轮流怠工，怠工浪潮此起彼伏。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怠工行动非常恼火，便继续对工人挑衅。5 月 14 日，内外棉十二厂厂主突然宣布开除工人代表多人，当工人们去质问厂方时，却遭到资本家的铁棍毒打。当天，该厂夜班工人要求将被开除者复职，并以怠

工方式进行抗议。

5月15日清晨，当内外棉七厂工人上班来到厂大门口时，日本厂主突然宣布，由于十二厂工人罢工，缺乏棉纱，工厂决定停工待料。当时，内外棉十二厂是纺纱厂，七厂是织布厂，这两个工厂是业务协作单位，十二厂生产的棉纱供给七厂织布。实际上，七厂这时宣布停工，是日本资本家联合对付工人的一个大阴谋，企图借机离间十二厂工人和七厂工人的关系。因此，当事情发生后，沪西工友俱乐部及时提醒七厂工人不要上日本资本家的当。这样当资本家宣布停工后，七厂工人们仍然守候在大门口，坚持要上工。双方相持不下，最后经巡捕房调解，厂主答应停工两天，停工期间厂方发给工人半日工资，以后照常开工。于是日班工人开始离开工厂。然而，工人刚一离开，厂方即贴出布告，只说停工两天，而对发半日工资一事，未提只字。是日下午5时左右，七厂夜班工人又来上工，但资本家紧闭厂门，并否认发半日工资之事。工人们被激怒了，准备向厂内冲击。这时，日本的大班、点名员、印度巡捕全部躲进厂内，任凭工人要求，都不搭理。工人们更加气愤，一面高喊“我们要上工”，一面奋力冲门。站在最前面带领工人斗争的，就是共产党员、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年仅20岁的顾正红。

“哗啦”一声，大门撞开了，工人们一拥而入。这时候，守候在厂内的印度巡捕、日本大班、日本点名员、包打听，个个手持铁棍、刀柄、木棒，对冲进工厂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劈头盖脸地猛打。工人们躲避不及，有好几个人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日本大班川村手里拿着手枪，腰间挎着佩刀，正指挥一群打手围攻人，突然看到自己一向注意的顾正红迎面冲来，便扬起手枪，对准顾正红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了顾正红的左腿，顿时，殷红的

鲜血顺着裤管流了出来。但是，顾正红没有退缩，他继续指挥着工人往前冲。凶残的川村见顾正红如此顽强，紧接着又向顾正红头部、腹部连击三枪，并拔出刀，向顾正红猛刺。顾正红倒在了血泊中。打手们见大班开了枪，也就壮了胆，挥舞着棍棒和刀，更起劲地向工人猛打、猛刺。这场搏斗，工人重伤 7 人，轻伤数十人。这就是“顾正红事件”的由来。

日本人残杀顾正红的流血事件发生后，内外棉厂工会发表宣言，公布事件经过，控诉日人暴行，并对日本厂主提出惩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 8 项要求。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 8000 工人愤而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共产党也呼吁社会各团体抗议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的暴行，声援工人人们的正义要求。

5 月 17 日，顾正红在捕房医院逝世。

5 月 24 日，内外棉各厂举行大会，公祭顾正红。公祭会场设在潭子湾三德里。这一天，三德里人山人海，公祭会场一派庄严、肃穆、悲愤的气氛。会场四周，挂满了挽联、挽幛和悼念匾额。中间白色帷幕前挂着烈士顾正红的遗像，两边悬挂着沪西工友俱乐部领导人刘华亲手书写的横额“工人先锋”和挽联“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公祭大会分设 5 处讲台，由各团体、各学校的代表轮流演讲，诉说惨案经过，控诉日人暴行。公祭大会实际成为一次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员大会。

以顾正红事件为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迅速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潮，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帝潮流。

就在中国工人阶级掀起反帝浪潮的时候，在上海，先于工人

运动而产生的另外两股反帝潮流，这时也呈汹涌之势。这两股反帝潮流，一股是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越界筑路的斗争，另一股是上海民族工商界和市民反对租界当局提出“四提案”的斗争。

“越界筑路”是帝国主义者扩充租界范围惯用的手法，他们先在租界外廉价收买一些土地，强行取得筑路权，然后修筑一条马路，把大片的土地圈在里面，再修筑一些道路以互相贯通，并派出巡捕巡逻，如此，久而久之这一片土地就纳入了租界范围。1925年4月，工部局（帝国主义设在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机关）又故伎重演，扩大租界范围，在北新泾、徐家汇、虹桥等地强占民田、掘坟毁茔、拆除民房，强行竖桩插标、铺设管道，昼夜施工。工部局越界筑路，激起了沪西及全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一些越界筑路的地方，人民群起反对，将工部局竖立的界桩、木标纷纷拔除。5月初，上海人民反对越界筑路的斗争日益高涨，人民群众自发组织“国民保土会”，各社会团体也纷纷向北京政府发出呼吁，要求政府严正交涉，制止越界筑路。顾正红事件发生后，这股反帝潮流更是汹涌澎湃。

上海民族工商业者和广大市民反对租界当局提出“四提案”的斗争，其起因是这样的：1925年前后，帝国主义的公共租界里设立有所谓的纳税外人会议，凡租界里的一切重大事情，如预算、决算、征税、修改法规等，都得提交这个会议审议拍定。这个纳税外人会议，类似于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1925年4月，公共租界纳税外人会议常年大会举行例会，工部局提出“四提案”提请会议通过。所谓“四提案”其主要内容是：（1）增加码头捐税。（2）印刷附律案。它规定居住在租界里的华人凡印刷信柬、会章、校规、族谱、讲义、广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请柬、启事，

都必须向工部局注册。(3) 交易所注册案。凡华人在租界里开设交易所，须向工部局登记领照，方得营业。(4) 改善雇佣童工案。显然，“四提案”严重地损害了租界里中国人的利益。“增加码头捐税”和“交易所注册案”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遭到打击，“印刷附律案”使各阶层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交往自由受到严重限制；“改善雇佣童工案”则是满篇虚伪之词。“四提案”一公布，立即遭到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结果“四提案”未能获得通过。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工部局又准备在 6 月 2 日再次召开纳税外人特别会议，以通过“四提案”。消息传开后，再次激起上海学生、市民和工商业者的反对。到 5 月下旬，离纳税外人会议特别会议的会期越来越迫近，上海人民的反抗也日趋强烈，并渐次汇集成一股反帝潮流。

上述这三股反帝潮流，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这些反帝斗争把上海的工人、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广大市民等各个阶层都卷了进去。到 5 月下旬，这三股反帝潮流逐渐汇集成了澎湃汹涌的巨流。在这种情况下，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同各阶层人民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转变为鲜明的政治斗争。会议决定于 5 月 30 日下午组织学生上街，举行反帝演讲大示威。

演讲示威本来是定在 30 日下午 1 时开始的，可是广大青年学生的反帝怒火早已按捺不住，30 日一大早，南洋大学、上海大学、同文书院和复旦中学的学生，即向南京路进发。学生们一到南京路便分散开来，有的在街头演讲，有的散发传单，另外一些学生则忙着把红红绿绿的标语贴在街道两边的墙上、电线杆上，甚至商店的橱窗上。“反对增加码头捐”、“取消治外法权”、“反对印刷附律案”、“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外人在华一切租界”

等标语，把反帝大示威的主题鲜明地揭示出来，使南京路上的反帝爱国气氛更加浓烈。

下午 1 时过后，南京路上演讲的学生越来越多，一部分工人也自动加入。平日这里就是游人如织，今天这里的人显得比以往更多。平时人们到南京路主要是为了观光、采购商品，今天人们的注意力却不再是集中在商店的柜台上，而是集中在商店外面的街道上。只见在街道中间，人们一堆一堆地聚着，每堆人的中间，都有一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在高声讲演。他们或诉说顾正红事件的经过，或揭露“四提案”的实质。围在旁边的群众，则时而静静地倾听，时而热烈地鼓掌。那种场面，真可谓：讲者激情高昂，听者无不动容。繁华的南京路，平时帝国主义者耀武扬威，这时却变成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唤醒国民觉悟的大课堂。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终于为帝国主义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察觉了。下午 2 时许，一队队长身虬髯的“红头阿三”（印度巡捕）紧急出动，赶到南京路，四处驱散群众，逮捕学生。但是南京路人山人海，群众赶不胜赶，学生逮不胜逮，巡捕们被搞得手忙脚乱。

巡捕继续逮捕学生，把被捕的学生都送往老闸巡捕房看押。老闸捕房里学生迅速增多，由几十人到 100 余人，不久，又超过 200 人。巡捕房大肆逮捕学生，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怒。学生一队队向老闸捕房集中，听讲的群众也朝这里赶来，人流从四面八方在这里汇集。下午 3 时许，小小的捕房，被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群众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学生带领群众高呼口号，一时间，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反帝传单也在捕房门前四处飘飞。巡捕房前，英国捕头爱活生指挥巡捕 22 人，呈半月形排列守在捕房大门口，群众则站

在距巡捕约 1 丈远的地方，双方对峙着。示威的群众情绪激昂，爱活生则在捕房门前不停地来回走动，一言不发。到了下午，突然他住脚转身，向巡捕们下令：“准备 瞄准 射击！”巡捕们立即对群众开了枪。这一切突如其来，示威群众根本来不及反应，就纷纷中弹倒下了。霎时，南京路上枪弹横飞，血流遍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大惨案”！在这次屠杀中，13 位同胞当场遭枪杀，数十位受重伤，轻伤无数！

面对帝国主义的枪弹，上海人民沸腾起来！当晚，中共中央、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国学联、上海各工会和各马路商联会以及上海各大团体纷纷集会，商讨对策。中共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反帝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中间去，领导各界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在上海实行“三罢”斗争，罢工、罢课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工人、学生的反帝热情一向很高，工会和学联又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只要党中央一声号令，罢工、罢课就会立即实现。但是要争取商人罢市，却要费一番努力。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小工商业者是同情和支持学生的，大资本家的态度却不明朗。当时在上海，工商界的权威组织是“上海总商会”，它是代表大资本家利益的团体，在上海素有“商界领袖”之称。上海罢市，没有总商会的认可是无法实现的。所以，5 月 31 日，上海的学生、工人聚集到北河南路 722 号总商会的办公地址，要求下令罢市。五卅惨案中的烈士家属 30 余人也来到这里，请求伸张正义。然而，总商会的会董们却顾虑重重，迟迟不愿表态。他们一则害怕帝国主义镇压，二则担心罢市会给自己造成损失。会董们先是表示，分电北京政府和江苏省督军、省长，报告惨案经过，请求严重交涉云云，企图搪塞学生。但是，当副会长方椒伯宣布这个决定时，群

众听了，坚决不答应，并声称：不宣布罢市，决不离开！这样经过各代表多次恳求，一直等到晚上 10 点过后，方椒伯看到群情激愤，几千人聚着不散，最后被迫签发罢市通告：“鉴于我国同胞惨遭枪杀，本会决定实行总罢市。”群众看了通告，一致鼓掌，然后满意散去。

6 月 1 日，上海开始实现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

罢市这一天，公共租界里的大公司、小商店一律停止营业。店门上贴着“惨杀同胞，休业志哀！”平时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南京路，现在却是店门紧闭、街衢萧条。6 月 4 日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全面罢市。商店、交易所、银行、钱庄、报馆和转运、粮食、保险、糖业、肉食、渔业、菜市、煤炭等行业，都加入了罢市的行列。仅在公共租界，参加罢市的店铺即达 2 万余家。

罢工运动则更是汹涌澎湃。5 月 31 日夜，上海各工会联合成立上海总工会。总工会成立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号召工人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屠杀，举行总同盟大罢工。6 月 1 日，上海英、日工厂的工人首先宣布罢工。2 日，英国电车公司、杨树浦电灯厂等公用事业企业里的工人宣布罢工。4 日以后，罢工浪潮席卷了各行各业，连外国人雇佣的中国厨师、侍者、奶妈，各大饭店的西崽（受雇于各大饭店、宾馆、领事馆的华工）也先后罢工，公共租界里的大部分华捕也宣布罢岗。在五卅运动中，在上海总共有 25 万工人参加了罢工。

学生的罢课也搞得有声有色。自 6 月 1 日起，上海各大、中学校，纷纷发表宣言，宣布罢课。参加罢课的学生达到 5 万人以上。学生们罢课后，走上街头，或示威游行，或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或劝导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一向远离政治的美国人所办

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这时也不顾校方的刁难和反对，宣布全体罢学，华籍教授宣布全体辞职，加入了反帝爱国运动的行列。

6 月份，上海的“三罢”斗争达到高潮。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上海各爱国阶级、阶层结成了统一战线。6 月 4 日，上海总工会、全国学联、上海市学联、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联合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反帝爱国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后，立即根据上海各界人民的反帝要求，拟订向帝国主义提出交涉的条件，作为上海各界人民反帝斗争的共同纲领。6 月 7 日，经过讨论最后议决了先决条件 4 条和交涉条件 13 条。先决条件为：（1）取消戒严；（2）撤退陆战队并解除万国商团及巡捕的武装；（3）释放被捕者；（4）被封和被占领的各学校一律恢复原状。交涉条件包括惩凶、赔偿损失、道歉、华人在租界内有言论结社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收回会审公廨（音 xiè，古代称官吏办事的地方）、取消领事裁判权、制止越界筑路、永远撤退驻沪的英、日海陆军等。上述的 17 项条件受到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

上海人民“三罢”斗争的深入开展，使帝国主义受到了沉重打击。尤其是上海工人大罢工，对帝国主义打击最大。在工人罢工的日子里，资本家的工厂关门、轮船停驶、商店歇业。面包工人、中国厨师罢工，使外国资本家几乎吃不上饭；水厂工人罢工，使外国资本家有断饮之虞；电车、黄包车工人罢工，则使上海市的交通陷于瘫痪。平时，在租界里作威作福的洋大人，这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日子很不好过。

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风暴，像一阵惊雷，一阵狂飚，迅速席卷全国，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天津、青

岛、郑州、西安、南京、镇江、杭州、长沙、九江、武汉、广州、香港等城市，立即掀起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声援上海人民。在武汉，帝国主义者与人民群众发生了激烈冲突，酿成“汉口惨案”；在广州、香港，工人阶级联合发动了省港大罢工；在北京人民的倡议下，全国还开展了“6·25”全国总示威和“6·30”全国悼念五卅烈士的活动。尤其是省港大罢工，声势极为浩大。

上海“五卅惨案”和上海人民英勇斗争的消息传到广州后，5月31日晚上，中共广东区委即召开党团员大会，商讨声援上海人民的办法，当即决定由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一个临时委员会，联络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代会、省农协会、商协会、学联会、青年军人联合会6大团体，发起组织示威大游行，时间定在6月2日。6月2日上午，广州各界群众1万余人，聚集在广东大学操场召开“援助沪案示威大会”。大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森（即李启汉）主持，罗亦农代表中国共产党莅会发表了演说。大会向全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发出通电，并决定开展抵制英、日货运动。会后，群众举行了示威大游行。

当时的广州，为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所盘踞，他们正在密谋发动反革命叛乱，推翻大元帅大本营革命政府，形势十分危险。中共广东区委的当务之急是协助革命政府削平叛乱，故而未立即发动罢工。他们派出邓中夏、杨殷到香港，以全国总工会和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名义，分别与各工会组织联系，酝酿发动罢工；并由共青团广东区委派遣蓝裕业、周文雍等到香港，发动学生罢课。他们在香港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发动组织工作，并成立了总的领导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在广州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由林伟民、李森等负责。6月13日，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所组织的“省港大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成立。这

样，罢工酝酿便告成熟。6月16日，革命政府平定了杨、刘叛乱，更为组织、发动省港罢工扫除了障碍。

6月19日，省港大罢工正式爆发。香港海员和电车、印刷工人率先响应，接着洋务、起落货、煤炭等各行业工人继之行动，前后持续约16个月，罢工人数由最初的10万迅速发展到25万。全港工团联合会宣布罢工后，于21日发表罢工宣言称：“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力的屠杀，是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宣言并向港英当局提出了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等6项条件。

香港的中国工人罢工后，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亦于6月21日实行总罢工。3000多中国工人离开沙面，回到广州市区，随即成立“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对沙面实行封锁，组织罢工纠察队，把守东桥、西桥及沙基沿岸，不许船艇出入。

6月23日，广州各界人民联合省港罢工工人5万余人，举行游行大示威。队伍浩浩荡荡，秩序井然。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陈延年、周恩来等都亲自参加。当游行队伍行至沙基西桥时，防守在沙基西桥的英军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白鹅潭及沙基口的英、法、葡等国军舰亦同时开火，弹如雨下，游行群众猝不及避，登时血肉横飞，当场死52人，伤100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广东革命政府宣布与英国经济绝交，封锁港口。香港工人罢工由此进入高潮，有13万人纷纷回到广州。

省港大罢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州革命政府的全力支持。

香港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革命政府立即禁烟禁赌，并征用广州市区的烟馆、赌馆、会馆、空屋等地方作为罢工工人的宿舍。7月初，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布训令：着广东省政府拨借东园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办事处；广州市公安局征收半月租捐缴由中央银行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经费；广东省境内 29 个口岸禁止粮食出口；劝谕商民援助罢工工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汪精卫、廖仲恺等都担任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正是有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为后盾，才使这次罢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省港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严密而完备的组织，使罢工委员会始终能有效地领导 20 多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坚决斗争。在罢工中，一开始工人提出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一概抵制。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发现这种做法，一方面打击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少困难。因为实行全面封锁禁运后，外面的不能进，里面的也不能出，使广州的日用供应和广东的对外贸易都严重受损，影响市民生活，也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因此，7月底罢工委员会改变策略，提出“单独对英”的原则。这样一来，既封锁了香港，又发展了对外贸易，更得到广东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

在省港罢工工人的罢工、封锁和抵制的打击下，一向以繁华而著称的香港，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和空前困难的地步，香港变成了“臭港”、“饿港”、“死港”，在罢工期间英国每天经济损失达 700 万元。这种经济上的打击，一直影响到英国本土，伦敦的生产停滞、工厂倒闭、失业激增，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第一次遭到惨重失败，声威扫地。

省港大罢工一直坚持到 1926 年 10 月中旬才基本结束，但是，罢工组织机构仍然存在，直到 1927 年 10 月汪精卫回广东组

织国民政府后才被强行解散。罢工前后历时 2 年又 4 个月，成为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运动。

再说上海的五卅运动。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直采取血腥镇压的政策，五卅惨案发生后，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对行人严加盘查，发现学生模样的人便加以逮捕、枪杀，一片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资本家、买办利益的上海总商会首先害怕了。总商会对群众的“三罢”斗争一开始态度就很勉强，这时他们不顾各界人民的反对，决定于 6 月 26 日单方面宣布开市，退出了“三罢”斗争。

大资本家退出反帝爱国阵线后，中国的封建军阀也暴露出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伙同帝国主义共同镇压人民。在五卅运动刚刚开始时，北京的段祺瑞执政府曾假惺惺地派出专员与帝国主义进行交涉，奉系军阀也给上海工人捐款以示“支持”。但是，到了 7 月份，中外反动派便公开联合起来，镇压人民的反帝运动，奉系军阀充当了帝国主义的主要帮凶。当时奉系军阀控制着上海，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印发布告，取缔人民的“越轨”行动，声称“越轨即属违法，违法即当究办”，“按照戒严法予以枪决”。23 日，戒严司令部查封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当时的直系军阀，也配合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6 月份“汉口惨案”发生时，驻汉口的直系军阀萧耀南立刻宣布戒严，屠杀爱国群众。

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继大资产阶级退出“三罢”斗争后，中小工商业者也发生动摇，在“三罢”斗争中形成的反帝联合阵线解体了。在上海形成了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孤军作战的不利局面。于是，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调整策略，决定各业工人在资方答应一定条件后，即可复工。从 8 月中旬起，工人陆续复工，9

月 18 日，五卅运动宣告结束。

五卅运动，它以上海为起点，迅速席卷了全中国。在五卅运动期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总共有 600 多座城镇，1700 万人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参加人数之多，波及范围之广，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经过这次运动，中国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他们不仅对帝国主义的凶残本性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对中国军阀的本来面目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五卅运动初期，人民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帝国主义的。当时奉系和直系军阀的将领们，都曾捐款“援助”死难同胞，段执政府也频频向外国公使团提出抗议照会，但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沽名钓誉，没有多久，他们便转而伙同帝国主义镇压本国人民。中国军阀对人民的屠杀，其凶残程度丝毫不亚于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要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就必须首先铲除国内的军阀统治。因此，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为全国人民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作了一次广泛的政治总动员。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工农运动深入发展，尤其在广东革命根据地，省港罢工工人热烈拥护国民政府，直接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和南讨军阀邓本殷的战争，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后来，北伐战争开始后，部分罢工工人又参加了北伐战争。

五卅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标志着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